

空间流转与数字赋能：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与身份协商

张盈盈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5日

摘要

在城镇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的推动下，农村随迁老人面临着空间流动下社会适应和身份失调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与身份协商问题，探讨其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如何通过积极的日常实践应对身份危机，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实现自我重构。研究发现，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中普遍遭遇“身份超载”“身份断裂”与“身份悬置”三重困境，在此背景下，老人通过信息资本的转化、熟人网络的跨地维系以及数字技能的再社会化，得以在日常生活中重建社会联结与自我认同。进一步地，身份协商呈现出三种路径：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弹性”身份、平衡于客观期待与主观认同之间的“液态”身份，以及立足于数字契约系统的“契约”身份。

关键词

农村随迁老人，身份协商，社会适应，数字技术，空间流动

Spatial Mobility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Soci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Elderly Migrants in Rural Areas

Yingying Zh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elderly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face

文章引用：张盈盈. 空间流转与数字赋能：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与身份协商[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15-22.
DOI: 10.12677/ar.2026.138520

challenges related to soci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dissonance resulting from spatial mo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s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this group, exploring how they address identity crises through proactive daily practices during the urban-rural migr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self-reconstruction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elderly migrants commonly encounter a triple dilemma of “identity overload”, “identity rupture”, and “identity suspension” in urban lif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y are able to rebuild social connections and self-identity in their daily live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 the cross-regional maintenance of familiar networks, and the resocialization of digital skills. Furthermore, identity negotiation manifests through three distinct pathways: a “resilient” identity that traverses urban and rural spaces; a “fluid” identity that balances objective expectations with subjective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 “contractual” identity grounded in digital contractual systems.

Keywords

Elderly Migrants in Rural Areas, Identity Negotiation, Social Adapt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Spatial Mo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性压力影响下,传统“养儿防老”的双向互惠逻辑转变为“恩往下流”资源输送模式。农村随迁老人出于帮助子女照看孩子、操持家务或养老的原因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个人活动局限于子代家庭空间范围内,普遍面临着自我概念的认知偏差与适应障碍。一方面,个体由家庭劳动力向退休群体转换,另一方面,其角色亦从家庭决策核心退化为辅助性成员,面临着“角色丧失”(Role Loss)与“角色中断”(Role Discontinuity)的问题。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正经历着深度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已全面渗透并重塑了城市生活的运行逻辑与交往范式。对于刚刚脱离乡土语境的随迁老人而言,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已不再仅仅是远距离人际沟通的技术工具,而是成为其在异质化城市空间中获取公共资源、维系社会网络并寻求情感补偿的核心介质。

而关于身份的概念,身份指的是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1],其能够确定个体关于自我的认知及对特定价值问题的立场和态度[2]。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后由美国学者 Stella Ting-Toomey 引入传播学研究,是指个体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空间背景下,围绕多元身份关系而展开的身份建构过程,目的在于建立与环境的有效联系,维持身份认同的统一[3]。身份协商是一个动态过程,此中,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交流,维护、调整和挑战自我和他人的身份。通过身份协商,个体可以构建新的身份,获得理解、尊重和支持[4]。基于此,本研究引入“身份协商”这一核心分析概念,旨在探讨农村随迁老人在历经空间流转与遭遇结构性认同危机后,在技术的赋能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达到自我同一性和归属感,以确立身份安全感。

2. 文献综述

现代社会中,个体围绕身份认同展开的身份协商具有普遍性。个体基于身份上的认同可以在持续的

时间经验中形成连续性叙事,通过建构稳定的信任关系,个体能够建立抵御恒变环境中风险的安全体系[2]。同时,个体身份往往是群体关系结构的缩影,身份基础和来源应源于具有共同的社会互动与文化的群体,以为个体的身份认同提供内在动力。并且其指出,身份与乔治·米德(George H. Mead)的主客我理论相似的,身份也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次,并且处于不断的互动中。客观身份是社会对个体的一种身份要求,而主观身份是个体的一种主动建构,关系到情感与归属。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研究者较多的关注到了外部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于身份协商的影响。普遍认为不能孤立地将人抽离出所处的空间,而是要结合具体空间进行具体分析,并较多的将注意力放在“移民”群体。研究多聚焦于移民在不同空间之中的人地关系以及自我概念的特征[5]、个体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关于自身身份建构的策略以及微观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带来个体身份认同的摇摆与转变[6]。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身份协商的研究更具有本土的特点,即更加看重其在社会关系和家中的影响。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深嵌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自我更多作为发展和修缮人际关系的手段存在,可以说,人们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将发展家庭乃至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最终目的[7]。就情境而言,家庭不仅是物质场所和情感空间,同时还包含社会秩序、性别分工以及代际权力。个人对于家庭的认同离不开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与家庭成员不断互动、协商中形塑[8]。农村随迁老人群体兼顾空间迁移和社会关系变动的双重特性,并处于中国特有的家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双重视角下,其身份认同核心呈现子女家“局外人”与城市社区“陌生人”的双重困境,并且在晚年其由家庭支柱、决策者变为辅助者,其生活重心转向家庭,由于退休和经济地位的缺失,其社会角色难以进行代替和补充,自我概念就容易产生适应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农村随迁老人作为研究的对象。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类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展出关于自身的知识,并将它们与具体的“技术”相结合进而生成认识自身的工具[9]。在数字化背景下,身份协商的场域已经超出了实体的情境,内嵌于技术中[10]。其不仅是用复制技术进行传播沟通的一种社会设置,其同时具有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的特性,具备了一种自我生产与自我扬弃的能力。它们不仅提供了自我表达与展示的工具,更内嵌了引导个体进行自我审视、分类与管理的逻辑[11]。可以说,技术建构了一个社会个体展现、传播和获得认同的舞台。个体在这个舞台中,通过特定的符号、叙事和行为进行自我呈现和互动,从而不断地确认、调整甚至重塑自己的社会身份。

综上,身份协商作为流动群体融入在地社会、建构社交网络、获得身份归属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身份协商的研究较多的关注到了跨国的移民群体,而对于城乡流动中老年群体的身份协商研究还不充分。并且,有关于中国乡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多聚焦于地理迁移导致的家庭结构转型,而对农村老人晚年的心理状态与自我认知和协调缺乏系统考察。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流动化背景下农村随迁老人的身份困境与数字技术的作用,分析该群体在跨越城乡物理边界后,如何通过日常实践缓解多重角色困境并达成身份协商。

3. 空间流转: 流动情境下随迁老人的身份危机

空间并非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移载体,更是个体意义建构与身份生产的核心维度[12]。地理流动性涌现出复杂的主体性形式,流动包含离别、流转和社会网络延伸的动态过程,农村随迁老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生态,而自我是一种关系性的成果,在与新环境、新个体的具身互动中其具身体验与身份塑造也发生了变化,在多重地方性的交织影响下,老人的身份边界开始模糊,并在多重角色的拉扯中陷入了深层的社会身份危机。

3.1. 身份超载: 核心决策者与多重照顾者

流动群体的跨地方流动引致社会关系、权力的动态变化,个体身份、日常行为习惯等主体性内容便

在社会性的影响下发生转变[13]。在乡村传统的权力格局中，老人往往作为家庭长辈或生产组织者存在，其身份建构基于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与家族资历，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与决策权。然而，现代城市生活高度依赖于市场化的经济收入与现代知识体系，随迁老人由于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和现代生活技能的匮乏，被迫完成了权力让渡，其角色亦从家庭决策核心退化为辅助性成员。传统“养儿防老”的双向互惠逻辑也转变为“恩往下流”资源输送模式，代际支持的重心也通过空间流动实现了跨域转移[14]。农村随迁老人出于帮助子女照看孩子、操持家务或养老的原因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个人活动局限于子代“家”空间领域范围内，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其身份被迅速功能化，沦为子女家庭中的照顾者。

进入城市的子代家庭后，老人的生活重心几乎全部倾注于家庭内部的日常照料与代际抚育，这使其在微观家庭场域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角色重压。这种身份的“超载”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的繁重，更体现在角色期待的激增。在城市狭小的家庭空间内，他们必须扮演全职保姆、育儿专家、家政人员等多重角色，以支持子代在城市职场中的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随迁老人的身份越来越被工具化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削弱了自我的独立性，使老人的主体意识被压缩在“后勤保障”的范畴内，陷入了角色功能单一与劳动内容多重并存的身份困境。

3.2. 身份断裂：乡土联结者与城市外来者

个体的社会身份高度依赖于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中国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是空间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流动意味着对原有空间的打破，意味着“脱域”，代表着旧有社会关系的打破[15]。在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特征的乡村秩序中，老人凭借长期的地缘与血缘交往，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他们不仅是乡村信息流转的关键节点，也是乡土社会资本网络的核心维系者，老人的身份认同与其所处的村落结构中的功能性位序高度统一。然而，随迁过程引发的“脱域”，使其原有的社会资本难以在异质性的城市空间中实现跨场域转化，进而引致身份的结构性断裂。

在陌生的城市空间，农村随迁老人脱离了原生的社会支持系统，进入原子化的城市社区环境。由于语言表达、生活习惯差异的影响，随迁老人在移居初期难以构建基于业缘或趣缘的新型社会关联，其在乡村场域内积累的社会声望与互动规范，在城市秩序中面临失效。在物理维度上，随迁老人与城市居民虽同处于一个居住空间，但在社会心理与互动层面却存在显著的隐性区隔，这种从熟悉关系到陌生的转变，导致老人被隔离在城市话语体系之外，演变为脱离乡土与游离于城市社区边缘的外来者。

3.3. 身份悬置：乡土归属者与家庭暂居者

空间不仅是物理容量，更是情感与意义的载体，直接关乎个体的“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本体性安全感体现为个体对自我认同连续性的信心，以及对所处社会与物质环境恒常性的基本信任。当空间作为一种稳定且具意义的客观存在时，它能为个体提供基于信任的可靠性体验[16]。因此，空间不仅构成了生活的物质基础，更通过环境的恒常性支撑着个体的主体性认知，是维持个体心理秩序与自我认同稳定的核心要素。在乡村，环境的恒常性源于邻里间的日常互动与熟悉的景观，这种稳定性为随迁老人提供了心理安全感；而在城市，单元楼结构与陌生的邻里关系打破了这种熟悉与恒定，阻断了老人原有的认知路径，无法提供情感的归属与价值的认同，造成了其在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

随迁老人的身份危机，在深层次上表现为空间认同的错位与心理归属的真空。在子代的家庭空间中，随迁老人面临着空间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错位，尽管其与子代是共同居住，但由于房屋的产权性质、装修风格以及日常生活节律均由子代主导，老人对该场域只能实现有限的改造。在这种受限的私人领域内，老人不仅失去了对物质环境的全面控制感，更在心理上陷入一种“客居”或“寄居”的状态，将自我

退至次要的空间边缘。这种身体在场而心理归属缺席的状态，使得随迁老人的自我认同被卡在城乡的阈限空间中，他们的身份既不属于完全的乡下人，也非真正的城里人，而是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浮的“悬置”状态。

4. 技术赋能：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再融入

在数字化生存成为社会常态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是个体重构社会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关键工具。农村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并非消极的被动调整，而是在数字赋能下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适应策略，其通过数字空间的场域调适，建立起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结与身份确认。

4.1. 资本转化：数字赋能下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的借力

在社会交换理论视域下，信息的占有与传递是资本转化的核心环节。农村随迁老人利用数字化手段掌握健康资讯、社会福利或城市生存技能，并将其在家庭内部及同辈群体中进行主动传播时，信息的流动便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稀缺资源。与此同时，老人在数字平台上有意识的自我呈现，不仅重构了其积极、能干的个体形象，更通过信息的互利共享赢得了他人的认同与情感依赖。在这种基于信息交换的社会互动中，老人所拥有的技术素养成功转化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威望，使其从家庭生活中的被动受助者转变为具备资源调配能力的信息提供者。这种地位的跃迁显著增强了老人在家庭决策与社区交往等资源分配场景中的话语权，从而在宏观的社会适应过程中实现了个体主体性的重塑。

4.2. 跨地维系：技术中介下的熟人网络修复与情感治理

当现实社交网络因地理流动而发生断裂时，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虚拟在场成为随迁老人实现情感补偿的核心机制。跨时空的网络维系本质上是个体能动的情感治理过程，老人通过参与家乡的日常琐事、仪式见证及同辈群体的远程互动，有效对冲了空间流转带来的疏离感与身份焦虑。这种虚拟在场不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社会关系的心理延展。不仅修复了因迁徙而受损的社会资本，更在心理层面提供了本体性的安全感，使老人在城市生存中得以保持乡土身份的连续性，最终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交织，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新锚定与心理秩序的自我重建。

4.3. 再社会化：数字文明中的技能习得与社会适应

再社会化是农村随迁老人通过内化数字文明规范与生活技能，实现角色转换与生存秩序重建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以数字化生存技能的习得为起点。农村随迁老人对数字工具的习得与应用，本质上是个体向城市现代性体系靠拢、重构社会参与权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老人通过自主学习或代际反馈，逐渐掌握移动支付、地图导航、在线预约挂号等数字技能。这些工具性实践打破了城市生活对老人的技术壁垒，增强了其对现代都市环境的掌控感与自主性。随着技术门槛的跨越，老人的生活半径从子女的家庭空间向开放的城市空间延伸，从被动的寄居者转向具备社会行动能力的城市参与主体，实现了社会功能的局部修复与自我认知的重构。

5. 身份协商：多元身份中的主体回归

空间的迁移深度影响个体的行动逻辑、认知与情感体验，决定了人们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寻自身定位^[13]。在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中，个体往往承载着多重且异质的身份属性。身份协商正是农村随迁老人基于自身生命历程与空间位移而采取的长期性建构策略，旨在实现主体性的重塑^[17]。因此，考察随迁老人的认同问题，需要将其置于较长的时间维度与复杂的空间背景下，透视其身份持续建构与重

构的动态过程。

5.1. 穿梭于城乡二元认同之间的“弹性”身份

个体的身份具有流动性与建构性,被赋予一个身份,就被指派到了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位置上[18]。数字时代身份的建构方式发生改变,人能够通过自主参与叙事身份,可以不再按照相对固定的时间脉络和空间轨道来设定身份,而是进行一种灵活、场景化的弹性自我身份确定和身份认同[19]。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其面临的并非单一的城市化秩序,而是置身于城乡二元社会规范的交叉地带。在这种结构性张力的影响下,他们的身份协商就具备一种适应城乡情境之间的“弹性”特征。随迁老人虽然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但是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乡土的生活。例如,通过智能手机与微信群落高频度地关注乡音乡情、介入家族事务的讨论,或是亲身参与家乡的婚丧嫁娶等传统的人情往来与仪式性活动,对其原有社会资本的激活与再生产,此中乡土认同构成了其抵御城市生活不确定性的本体安全感,确保了自我认同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再者,进入到城市子代家庭与公共空间,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需要在行为和心理上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更多地褪去原有的社会显性特征,而适应子代的生活习惯与节奏,形成一种适应城市情境的新的身份角色。因此,其身份协商表现出一种弹性机制,即个体能够在保留核心自我概念和乡土文化底色的前提下,通过边界的灵活伸缩与情境化的角色切换来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认同冲击,重新确立自身的社会坐标。

5.2. 平衡于客观期待与主观认同的“液态”身份

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当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与归属感在既有社会结构中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个体便会采取积极的身份管理行动,通过意义重构来确立有利于维持自我价值的身份属性[20]。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现代社会中的身份是一种“液态”的存在,其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不稳定的,个体能够通过主动的身份管理行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持续重构身份的内涵,以应对客观期待与主观价值之间的矛盾[21]。在随迁语境中,农村老人在子代家庭上被期许承担家庭劳动与育儿辅助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要求,而老人主观上则渴望维持其作为独立社会成员的尊严感与价值感。为调和这一矛盾,随迁老人在技术使用中通过非正式的微观实践来进行认同的自我赋权,而展现出一种避开结构制约的“液态”特征。他们不再仅仅将家庭照料视为一种被动的体力付出,而是通过主动的意义赋予,将其转化为证明自身家庭价值、维系代际情感的主动行动,比如在媒体上展示个人和照料孙辈的日常,将生活赋予仪式感。同时,在繁重的家庭功能之外,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参与线上生活,积极开拓游离于家庭角色之外的个人空间。这种不断流变、渗透的身份管理策略,使得老人能够在被高度工具化的客观期待与追求主体独立的内在需求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从而恢复自我效能感。

5.3. 立足于数字技能与线上生活的“契约”身份

亨利·梅因(Henry Maine)提出的“契约社会”论点探讨了社会从基于血缘和习俗的传统结构向基于法律和契约的现代结构转变的过程[22]。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时间与空间得以分离,人们部分地将传统社会里系于定居地点的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投射到了普适性的抽象契约系统中,由此形成了一种“契约身份”认同——人们认同的对象实际上已经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隐藏在场所形式下的信任及契约关系[23]。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从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到公共交通、医疗预约,一套基于契约与系统信任的数字化运行逻辑,构成了都市日常生活顺利开展的基础性条件。数字技术不仅是信息获取的工具,更是执行与维系现代社会契约的中介。农村随迁老人在主动接入和子代反哺下逐步掌握智能手机的操作逻辑与

各类服务程序，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与现代城市的抽象系统建立信任关系。其作为现代契约的参与者与参与者，数字技能的习得极大地拓展了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行动空间，帮助他们打破因物理空间收缩而造成的社会隔离，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通过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场域中获取便利、完成交易并建立新的社会联结，老人不仅重构了条理化的生活秩序，更在技术赋能下重获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自信心。

6. 结论与讨论

在城镇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下，农村随迁老人在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空间流动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着多重身份困境。然而，这一群体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日常实践中主动适应新环境和现代数字生活的积极行动者。其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重新获得家庭与同辈群体中的话语权；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跨地维系熟人网络，进行情感补偿；并通过内化城市数字生活规范，实现了再社会化，成为自主积极的城市参与主体。在此过程中，随迁老人的身份协商呈现出“弹性”“液态”与“契约”三种策略性路径，共同构成了其在流动语境中实现主体性回归与社会再融入的动态机制。

然而，数字赋能也并非没有局限性与负面影响。老年群体在数字技能的习得的过程中受制于生理衰退、教育水平以及技术产品的适老化不足，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学习成本，部分老人甚至被永久阻隔在数字门槛之外。再者，数字生活也可能会带来个人信息安全泄露、网络诈骗、过度依赖虚拟交往而弱化现实联结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也需要去思考这种“赋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社会分层中的边缘位置。除了利用数字技术在微观的日常层面帮助老人获得便利与认同外，更需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便携性的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支撑，共同构筑真正包容的老龄友好社会。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随迁老人身份协商的微观逻辑与能动路径，但未能全面涵盖深度数字鸿沟下的边缘群体，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并深入探讨不同的老年群体在数字赋能下的差异化境遇。同时，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迭代，老人的身份建构场域将持续拓展，其身份协商的新形态与新机制值得深入关注，以期构建技术温情的数字化老龄友好环境。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乡互望：乡村传播转型研究(23FXWB00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媒介可供性视角下返乡青年“城乡两栖”适应路径研究(2024SJZD143)。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326.
- [2] 季乃礼, 许博.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份认同: 实证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23(6): 12-25, 138-139.
- [3] 赵静, 杨宜音. 城管的身份认同威胁及其身份协商策略[J]. 学术研究, 2017(4): 63-68.
- [4] 林仲轩, 仲崇源. 祖籍国社交媒体使用何以重塑自我——对来华华裔新生代身份协商的考察[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4(3): 48-57.
- [5] 刘云刚, 周雯婷, 黄徐璐, 等.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976-986.
- [6] 李锦昊, 陈浩然, 马凌. 越南难侨的身份协商与国家认同——基于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案例[J]. 人文地理, 2023, 38(1): 56-63.
- [7] 费梅苹, 杨瑛. 发展核心自我: 流动社会中自我视角社会工作的重构[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4): 122-129.
- [8] 蔡玲. 流动的背后: 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17-31.
- [9] 米歇尔·福柯. 自我技术: 福柯文选III[M]. 汪民安, 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54, 74-75.
- [10] 杨君, 林星宇, 蒋佳妮. 身份获取与空间再造: 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内生性逻辑[J]. 学习与实践, 2025(9): 101-113.
- [11]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 刘君, 李鑫, 漆俊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52.

-
- [12] Conradson, D. and McKay, D. (2007) Translocal Subjectivities: Mobility, Connection, Emotion. *Mobilities*, **2**, 167-174.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0701381524>
- [13] Pile, S. and Thrift, N.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 748-750.
- [14] 李永萍. 功能性家庭: 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2): 44-60.
- [15] 王卓, 刘小莹. 数字社群: 信息社会新型群己关系与演化逻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5(5): 128-138.
- [16]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80.
- [17] Burke, P.J. (2006) Identity Chang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9**, 81-96. <https://doi.org/10.1177/019027250606900106>
- [18] Berger, P.L. and Luckmann, T. (199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enguin Books Ltd, 1-219.
- [19]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戡,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60.
- [20] Deaux, K. (1993)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4-12.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3191001>
- [21]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21 p.
- [22] Maine, H.S. (1908)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John Murray, 151 p.
- [23] 薛彦波, 仇宁. 现代城市人与生存场所情感关系的转变[J]. 城市问题, 2013(6): 28-31.